古建筑中的“托梁换柱”

●周 乾

故宫太和殿内，施工技术人员正在揭露严重糟朽的柱根。　周乾供图

中国的很多古建筑能够屹立千年不倒，在人为保护因素外，其特殊的木架结构及榫卯连接方式起到重要作用，它们可以有效吸收、消耗外力震动带来的破坏，起到减震器的效果，这才出现了“墙倒屋不塌”的现象。

在古建筑中，一般选用粗壮、挺直、坚硬、耐腐的硬木来支撑和承担起整个房屋的架构和重量，俗称“顶梁柱”。在我国古建筑领域中，“梁”“柱”均为重要受力构件。“横梁竖柱”可形容梁、柱的形状特点。

关于“梁”“柱”的较早史料记载，可见《史记》卷三之“殷本纪第三”。“纣倒曳九牛，抚梁易柱也”，这句话的意思是，商朝纣王力大无穷，可以拽着九头牛，能够手托着梁换柱子。这句话说明“托梁换柱”修缮加固方法，至少在商朝时期就出现了。而我国古人在长期的建筑工程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托梁换柱”方法。

对于古建筑而言，位于地面之上的立柱，或因长期承受上部结构传来的重量而产生开裂残损，或因柱底部位长期受到地面潮气影响而出现糟朽残损，使得木柱强度下降，无法正常支撑梁，可采用“托梁换柱”的加固方法。

清代有“偷梁换柱”的记载。“偷梁换柱”实际就是“托梁换柱”。意思是，当房屋的某根原柱产生损坏需要更换时，为节省工料并没有对原柱进行原位替换，而是在原柱旁边设一根新柱，再撤去原柱，这种加固方式俗称为“托梁换柱”。

“托梁换柱”的加固技术在我国古建筑保护维修中得到了充分运用，其典型工程实例即为故宫太和殿某立柱的加固。故宫太和殿是我国现存体量最大、建筑等级最高的宫殿建筑，是明清举行国家重要礼仪活动的场所。2004年，工程技术人员在对太和殿进行勘察时，发现有一根立柱的下部出现了糟朽问题。主要原因是立柱被砌筑在墙体内，柱子周边潮气长时间排不出去，造成柱子下部糟朽。施工技术人员采取了“托梁换柱”方法进行了加固。

具体过程分为四步：揭露、托梁、抽柱、换柱。这根立柱位于太和殿西北角，且被砌筑在墙体内。立柱的直径约为1米，由若干木料包镶在一起，再用铁箍约束成一个整体。施工人员揭去表皮砖层后，发现立柱下部1/3的位置出现了严重糟朽，且原有约束立柱的铁箍也产生了严重锈蚀。

随后，施工技术人员采用“假柱”托住原柱上部的梁。“假柱”为完好的木料，被安装在原有立柱附近，用于临时支撑梁。“假柱”顶面与梁底间增设一块面积较大的木板，以利于梁传来的重量均匀地传至木柱顶面。

第三步，把柱子底部糟朽部分抽去，剩余的部分做成巴掌形。底部伸出柱子直径1/2的截面、柱子直径1.5倍的长度，用作与新柱搭接。

最后一步，用新柱替换原柱的糟朽部分。新柱与被抽去的糟朽部分同材料、同形状、同尺寸。新柱与原柱的剩余部分搭接后，不仅仅在外观形成一个整体的立柱，而且在竖向形成一定长度的搭接面。在搭接长度范围内用铁箍箍牢立柱，有利于新柱、原柱共同发挥支撑作用。换柱后，再把“假柱”拆除，即完成了原有立柱的加固。

在古建筑领域中，“托梁换柱”作为用于残损木柱加固的科学方法，不仅加固效果好，而且对建筑稳定性影响小，是我国古代工匠建筑智慧的反映。

范仲淹与青州

●李 森

提起一座城市，许多人会最先想到和它有关的历史名人。

青州位处齐鲁大地腹心，历史悠久，乃著名的华夏古九州之一和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北宋时期，青州作为京东东路首州和安抚使司治所，已发展成远近闻名的东方大都会。朝廷十分重视知青州人选，所谓“海岱之区，地望攸重；岳牧之任，邦选甚隆”。于是，涌现出一批结缘青州的历史人物——寇准、曹彬、王曾、夏竦、富弼、范仲淹、文彦博、庞籍、欧阳修、赵抃、曾布、刘摯、黄裳。皇祐三年（1051年），范仲淹的到来最使古州增辉。

范仲淹一生以身许国，戍边西北抵御西夏，推行庆历新政变法，建树卓越无须多言，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便是他永久的丰碑。范仲淹主政青州，是写出《岳阳楼记》五年后，已是六十三岁高龄，这里是他人生仕宦的终点站。其在青州，前后不过一年，却多惠政。一是面对青州灾荒，奏请朝廷留足一年军粮，其余全部赈灾救民。二是青州百姓田赋需运博州（聊城）交纳，范仲淹将田赋折价，派遣官吏携款前往博州购粮代交，不仅免除青州百姓长途运输的劳苦，而且发还了剩余钱款，“青民因立像祠焉”。三是传说当时青州流行红眼病，范仲淹用醴泉水熬制草药，控制住了疫情蔓延。范仲淹展现了一位尽心尽力、不负苍生的父母官形象。

明正德年间，大藏书家、左佥都御史邵宝赋诗《赠户侍王德华分赈东行》，语重心长地提醒即将出京赈灾的挚友——户部侍郎王琼：“燕山东去马骎骎，百姓应知使者心。野有赭衣人似兽，途多菜色米如金。天开岱岳增新观，春到甘棠复旧阴。若过青州须吊古，范公祠下石泉深。”在邵宝心目中，自京城赴山东遥遥千里路途，唯有青州范公祠分量最重，是最该凭吊的名胜古迹。

杰出的思想家顾炎武游历齐鲁，来到青州，不忘拜谒声名远扬的范公祠。这位志士痛惜大明亡国悲剧，咏出一首《范文正公祠》：“先朝亦复愁元昊，臣子何人似范公？已见干戈缠海内，尚留冠佩托江东。含霜晚穗遗田里，噪日寒禽古庙中。吾欲与公筹大事，到今忧乐恐无穷。”顾炎武不胜感慨明朝没有像范公这样的卓越贤臣抵抗外族侵略，保卫社稷，并表达了见贤思齐之心。源出顾氏思想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样，闪耀着震烁千古的爱国情怀，足以壮华夏民族魂。

范公辞世六七百年后，远在京城励精图治的雍正帝高度评价这位青州知州的历史功绩：“如范仲淹之治青州，广施惠政，溪泽忽涌醴泉，此皆载在典籍，信而有征者，并非朕褒扬。”

“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1934年春，风尘仆仆的冯玉祥来到青州范公亭，他壮怀激烈，手书对联一副并刻石纪念：“兵甲富胸中，纵教他虏骑横飞，也怕那范小老子；忧乐关天下，愿今人砥砺振奋，都学这秀才先生。”

自北宋以降，范仲淹的人格魅力长久地熏陶着青州，激励一代又一代的青州人胸怀天下，自强不息。正德至崇祯百余年间，青州英贤辈出，官员中位至六部尚书的朝廷重臣即有陈清、陈经、石茂华、王基、邢玠、冯琦、钟羽正、赵秉忠、董可威、曹珖十人之多，极一时之盛，成为青史新奇观。

现青州著名的范公亭公园，实发轫于范仲淹知青州时。公园建筑主要包括范公亭、范公井和范公祠，其中井亭一体，又称“范公井亭”，范公祠则系当初青州百姓为感念范仲淹体恤民情而建的祠堂。三者于历史上屡经兴废，今主体建筑为清末民初风格。公园内唐楸宋槐，枝繁叶茂，亭祠错落，景色宜人。北宋王辟之在所撰《渑水燕谈录》书中记有范仲淹主持修建范公亭、范公井的过程：“皇祐中，范文正公镇青，龙兴僧舍西南洋溪中有‘醴泉’涌出，公构一亭泉上，刻石记之。其后青人思公之德，目之曰‘范公泉’（后称‘范公井’）。环泉古木蒙密，尘迹不到，去市廛才数百步而如在深山中。自是幽人逋客往往赋诗鸣琴，烹茶其上。日光玲珑，珍禽上下，真物外之游，似非人间世也。”

范公亭公园虽处青州南洋河谷洼地，却是一片精神高地。范公去后千载，青州人仍对他一往情深。一代伟人范仲淹，与范公亭、范公井、范公祠同垂不朽。

敬事而信

●张艺瑶

敬事而信，出自《论语·学而篇》，原文是：“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意思是说，治理一个具有千辆兵车的国家，要严肃治事并有诚信，要节约财用并爱护人民，要根据农时来使用民力。“敬事”代表严肃的治事态度。在孔子看来，严谨认真地对待事情，以身作则，才能够使人信服。

《说文》：“敬，肃也。从攴苟。”攴，治也，治事肃恭之意。苟，急也，通亟，有自我告诫、自我反省之意。今也有说法认为“苟”是“敬”字的初文。“敬”字在“苟”字基础上累加义符而成，作为表示肃敬之义的专字，为端肃、敬慎之义。

“信”，《说文》解释为“信，诚也。”本义为言语真实，引申指诚实，不欺，信用。在先秦文字中，信字从人、言，或仁、言，会“人言可信”之意。直到现在，我们还经常说“人言为信”，就是期望人言诚信，这或许也是造字者的初衷。

听其言而观其行。判断一个人是否可信，要听他说的话，古语讲言为心声，说出来的话，在很大程度上就表示了人的内心。还要观察他的行为，言行是否合一，是判断一个人品行的基本准则。如果一个人言行一致，真诚老实，对待任何事情都能严肃认真，忠实可靠，说到做到，那么他就可以称得上是一个诚信之人了。

诚信之人，大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有一颗诚敬之心，故而能做到信实无欺，这恰恰源自于对待事物恭敬的心态和负责的态度。我们熟悉的“程门立雪”的故事，与其说是杨时延续自己拜二程为师的信诺，不如说是出于对老师之敬意、对求学之执着。这种诚敬并不只是履行一个诺言，而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处世态度。

“敬事”之“敬”，可以理解为严肃真诚地对待。这种态度就是一种信用。《四书章句集注》中，朱熹引杨时的话说：“上不敬则下慢，不信则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敬事而信就是要求领导者做到以身作则，专心致志，敬慎奉事，那么自然上行下效，万事可成。汉代飞将军李广身先士卒，打仗时遇到困难和危险，总是冲锋在前，所以“其士卒亦佚乐，咸乐为之死”，士兵心甘情愿随他一起去拼命，奋勇向前，从而战胜敌人。太史公司马迁对此评论道：“《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率先垂范的表率作用，是令人信服的最有力的力量。

“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于民也。”（《四书章句集注》）“信”是孔子教育学生的主要内容之一，在儒家思想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信，是诚实不欺、守信用，也是相信，是信任。对于治理国家而言，信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以严肃的态度，恭敬谨慎地对待政事，才能取信于民。孔子论治国，把敬事惠民列入首要。节约财用并爱护人民，根据农时来使用民力，这种对百姓负责的态度，就是对百姓有信的体现。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义无反顾地肩负起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使命，这是初心、是承诺，也是矢志不渝的行动。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什么事就怕认真，什么事就怕较真。胸怀理想，诚敬担当，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就没有实现不了的愿景。

诗酒月与蓬蒿人

●陈世旭

公元742年（天宝元年），已经四十二岁的李白忽然得到入京诏书，于是立刻回去与家人告别，并写下七言古诗《南陵别儿童入京》：

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
呼童烹鸡酌白酒，儿女嬉笑牵人衣。
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
游说万乘苦不早，著鞭跨马涉远道。
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求用心切、受宠忘形的神态跃然纸上，踌躇满志表现得淋漓尽致。过了将近一千三百年，我们依然能真切地感受到那种毫不掩饰的兴奋扑面而来。

后人誉李白为“诗仙”，但他最大的抱负是“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

李白“五岁诵六甲”；十五岁已有诗赋多首，并开始社会干谒，好剑术，喜任侠；十八岁隐居读书；二十四岁开始远游，次年出蜀，“仗剑去国”；二十七岁迎娶官宦女儿；二十九岁多次谒见本州裴长史，遭谗谤，上书自白，终为所拒；三十岁往长安，谒宰相及其他王公大臣，均无果；三十三岁开山田，耕读度日；三十四岁献唐玄宗《明堂赋》，次年献《大猎赋》，以博赏识，又结识卫尉，进而向公主献诗，一步步接近权力上层。在长安紫极宫，他遇见贺知章，立刻上前拜见，并呈上袖中诗本，其诗的瑰丽潇洒令贺知章惊为“谪仙人”。

由于公主和高官的赏识，李白被召进宫，玄宗降辇步迎，即令供奉翰林，陪侍左右。初春，玄宗行乐宫中，李白奉诏作《宫中行乐词》，赐宫锦袍。暮春，兴庆池牡丹盛开，玄宗与杨玉环同赏，李白又奉诏作《清平调》。每有宴饮郊游，必命李白赋诗以纪盛况，流传后世。

玄宗的宠信，让同僚不胜艳羡。李白自己却日渐厌倦，纵酒以自昏秽，以至“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他醉中起草诏书，伸脚让太监脱靴，“宫中人恨之，谗谤于玄宗，玄宗疏之，后玄宗赐金放还”，亦即变相撵出长安。

在《玉壶吟》中，李白很直白地总结了这段宫廷生活：

烈士击玉壶，壮心惜暮年。
三杯拂剑舞秋月，忽然高咏涕泗涟。
凤凰初下紫泥诏，谒帝称觞登御筵。
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
朝天数换飞龙马，敕赐珊瑚白玉鞭。
世人不识东方朔，大隐金门是谪仙。
西施宜笑复宜颦，丑女效之徒累身。
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

又有《蜀道难》，变幻奇谲，仙而不鬼，倏起倏落，忽虚忽实，烟水杳渺，可谓绝世奇文。它表面写蜀道艰险，实则写仕途坎坷，屡逢蹶碍，怀才不遇。

原以为能像管仲、张良、诸葛亮们一样干一番事业，却发现那不过是幻影；原以为能“平交王侯”，然而王侯们并没把他当一回事。“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不称情”，冯谖之鉴就在前面。他最终落了个“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失望，“行路难，归去来”的哀叹，“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的惆怅，“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的无奈。

出京，李白重新踏上了云游的漫漫旅途，在江淮一带盘桓。精神极度苦闷，一再去友人的山居为客，登高饮宴，借酒放歌，发泄胸中郁积。既然“抱用世之才而不遇合”，那就“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

时间像从天而降的黄河，疾逝不回。高堂上，明镜里，早上还是一头青丝，傍晚就白如霜雪。《将进酒》，篇幅不长，却五音繁会，笔酣墨饱，情极悲愤而作狂放，语极豪纵而又沉着，气势与力量震烁古今。

然而，“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除了感慨“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只能是“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尽管后人评这首《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如天马行空，神龙出海”，音调激越高昂，情感起伏涨落，如江河汹涌瞬息万变，波澜迭起，与艺术结构的腾挪起伏完美结合，达到了豪放与自然和谐统一，云云，但诗人的郁结之深、忧愤之烈、心绪之乱，以及一触即发、发则不可抑止的情状是无法掩盖的。当年直陈其事的赋体《南陵别儿童入京》兼采比兴，夹叙夹议，正面描写与侧面烘托相结合，在纵恣跌宕的笔调中，洋溢着实现抱负的极度喜悦和积极进取的奔放豪迈，可如今，这样的影子一点也见不到，更别说“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的气概和“日试万言，倚马可待”的自负了。

命运只给了他写诗的才华，却没有给他从政的机会。

年近耳顺，李白竟至于走到了流放路上，好在不久就遇大赦。九死一生的老人，写下《早发白帝城》，表达捡回一条老命的激动。

此后，李白与仕途绝缘，重新沦为蓬蒿人。从被赦到离世，几年间，颠沛流离于宣城、金陵。

李白看不起蓬蒿人，蓬蒿人却没有看不起他。乡野豪士汪伦修书邀请落魄的李白去他家乡，“诡云”那里有“十里桃花”“万家酒店”。李白去了，才知道“桃花”是桃花潭，并无桃花，“万”是一家店主的姓。但汪伦“款留数日，赠名马八匹，官锦十端，而亲送之”的盛情让他深为感动，他挥毫写下《赠汪伦》：“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这也是流传最广的李诗之一。

桃花潭在青弋江边一个普通的皖南乡镇。我去的那个傍晚，街上行人杳然。

晚年的李白几经磨难，潦倒几近乞丐。他自己在诗里说“群凤怜客鸟，差池相哀鸣。各拔五色毛，意重泰山轻”，说白了就是靠人周济过日子。

六十一岁，穷途末路的李白从金陵来到当涂，投奔当县令的族叔李阳冰。在此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有过一些快乐的日子，常与李阳冰豪饮纵谈，“大笑喧雷霆”。不过，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白发如霜草”，只能是“扪心空叹息”。到当涂的第二年十一月，他因“腐胁疾”病入膏肓，最终怀着满腔的悲怆饮恨而死。

当涂临江有名胜“李白捞月处”，称他是“醉酒后想去水中捞月而溺亡”，令人苦笑。转而又想，也许李白的死就该是跟他的诗一样，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吧。

五十五年后，宣歙观察使范传正从父亲的诗文中发现自家与李家有“通家之旧”，于是寻访到了李白的两个孙女，从她们那里得知“先祖志在青山……殡于龙山东麓，地近而非本意”，范传正“闻之悯然”，随后请人“躬相地形，卜新宅于青山之阳”，并亲自为新墓碑撰写了序文。

我很为这篇碑文所触动。它不仅清楚地记叙了李白子孙两代的生活情状，更重要的是刻画了他们的精神面貌。李白两个孙女的父亲伯禽早已“不禄而卒”，哥哥出走，“不知所在”。她们自己则“俪于农夫，救死而已”，成了农妇。虽然“衣服村落，形容朴野”，却“进退闲雅，庆对详谛，且祖德如在”。范传正劝她们“改适于士族”，就是改嫁读书做官的人，她们的回答是：“夫妻之道，命也，亦分也。在孤穷既失身于下俚，仗威力乃求援于他门。生纵偷安，死何面目见大父于地下？欲败其类，所不忍闻。”

这使范传正大为感动：“余亦嘉之，不夺其志。”而我从中看到乃祖李白的另一种遗产——骨子里的高贵与骄傲：“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

李白渴望“扶摇直上九万里”，但命运戏弄了他，就像他戏弄那些权贵。巨大的自我期许和同样巨大的冷酷遭遇形成反差，终至客死异乡，埋骨草野，构成了李白一生最大的悲剧。对李白强烈的功名欲，后人不乏诟病：他为求引荐说过肉麻的话，受到朝廷召见就得意忘形，以退为进择机而动故作隐士状，等等。但有一点我们不能不注意，李白的喜和悲，得意和失意，基于的是中国士子传统的建功立业、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而不是禄蠹之辈对权力的迷恋。

超拔于世的傲岸，使李白在失望的煎熬中成为一位顶天立地的诗人，而不是像庸人那样堕落为一个蝇营狗苟的宵小。

“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馀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石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这首《临终歌》纵使是不为世所用的临终绝唱，也像盛年时的高歌，大气磅礴。

李白绝对自信，“天生我材必有用”，但文学才华并不等于政治才能。我只看到了李白的诗才，其行政才干如何，因为没有做过专门研究，我无可置喙。据说他宣读并回复过一封外交文书，让满朝衮衮诸公羞愧。但这样的工作，今天一个外语专业的本科生就能完成。安史之乱后，本来好好的与夫人在庐山“巢云松”、观瀑布，他却跑去做李璘的幕僚，给自己招来流放之祸。凭这一点，就可见他的政治见识。即便他果真像自诩的那样能“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但对于漫长的文化史来说，多一个管晏那样的能吏，还是多一个李白这样的诗人，孰轻孰重，还真难说。古来诗人善治，能吏善诗，不乏其人，但把诗写到李白的水平，可以断言，一个也没有。

李白的一生，不离酒与月。“白也诗无敌”，多有酒与月。诗酒月与李白，是标配。中间倘夹进一只公文包，便是李商隐在《义山杂纂》中说的“花间喝道，看花泪下，苔上铺席，斫却垂杨，花下晒裩，游春重载，石笋系马，月下把火，妓筵说俗事，果园种菜，背山起楼，花架下养鸡鸭”，宋朝的《西清诗话》润饰为“清泉濯足，花下晒裩，背山起楼，烧琴煮鹤，对花啜茶，松下喝道”。一句话：杀风景。

龙明图片/视觉中国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下醉酒写诗，就是李白人生的巅峰，也是中国文学的巅峰。诗酒月因李白而高贵，李白因诗酒月而被奉为“仙”。

“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这个“饮者”，自然是才气冲天、诗写得超一流的饮者，不是有酒必喝、喝酒必醉、醉酒必烂、除了贪酒什么本事也没有的酒徒。至于“寂寞”，寂寞的又岂止是“圣贤”？多少帝王将相连同他们当时的不可一世早已无声无息地消失在荒野乱草下，被世人忘得一干二净。而李白，始终像郁郁苍苍的参天大树，直指中国文学的千古云天。

李白的伟大，在于他的语言天才，在于他的“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在于他的诗在他身后再也无人超越。这和他是不是王族世孙与李唐诸王同宗，是不是进了朝堂做了翰林供奉，没有一毛钱关系。有酒，有月，就有诗，有诗就有李白。即便一直就是蓬蒿人，只要与诗酒月同在，李白就注定是中国文化一个显著的符号。